

陈友冰 著

中学古文赏析

安徽教育出版社

33.3
63



中学古诗文考析



安徽教育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子虎

绘 图：刘培民

中学古诗文赏析

陈友冰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字数 160,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9,501—75,000

统一书号：7276·127 定价：0.86元

序

这本书的作者和我交往多年。上个月，他送来了书的誉清稿，笑咪咪地说：“请为我审阅一下吧！”这使我猛然记起三年前的一段对话。

“师专邀我去教古代文学，我想把教学笔记印发给学生，好不好？”

我说：“当然好。不过，把教学笔记发下去，一要加工备课，否则上课只好念笔记（讲稿）；二要加工修改，使笔记变成文章，否则印出去不好。”

“我愿吃这个苦头！”他说得很坚决。

近二十天，我翻阅了清稿，不禁要赞许作者时时刻刻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负责精神。

瞧吧，他在游山玩水时也没有忘记教学。他到过石钟山、天门山、褒禅山、庐山、黄山等地，每到一处，不是游玩一下就了事，而是结合课文进行考查；游后归来，又查典籍、翻方志，力求把课文讲准、讲透。

“我愿吃这个苦头！”此刻，我想起了他的话。

要考查古人文章中所描绘的地点，首先就要熟悉这些文章。这是备课的第一道功夫。作者说，当他初到某一地时，总是默诵有关诗文，找出要考查的问题。他曾说，他心里有一些疑点，诸如：褒禅山的“后洞”究竟在哪里？“碧水东流至此回”或“碧水东流直北回”，哪一句符合实际呢？“遥看瀑布挂前川”中的“前川”，实指什么？等等。现在，经过考查研究，他把许多疑点都解释得很确切、很清楚。

这使我又想起了他的话：“我愿吃这个苦头！”

把教学笔记加工成文章，是得花一番功夫的。作者在教学之余，为学生甘愿日以继夜地支颐凝想，奋笔疾书，这种负责到底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这使我又想起了他的话：“我愿吃这个苦头！”

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需要“我愿吃这个苦头”的人啊！在教育战线上，如果多一些为学生甘心吃苦的人，当是大好事。因为他们不仅有益于现在，也会有益于将来。

安徽教育出版社愿承印这本书，我也作如是观。

祖保泉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序	(1)
《敕勒歌》小札	(1)
《赠汪伦》考辨	(11)
形相类而味相异	
——谈王之涣《凉州词》及高适唱和诗	(19)
春兰秋菊 一时之秀	
——谈中学语文新选的两首唐代送别诗	(24)
《登鹤雀楼》考	(31)
千古唯有谪仙词	
——谈唐代几首咏庐山瀑布诗	(41)
形态相似 神情殊异	
——谈《回乡偶书》及几首同题材诗	(49)
《望天门山》考	(55)
《陋室铭》初探	(60)
《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地点辨	(67)
《芙蕖》与《爱莲说》析异	(75)
《桃花源记》辨析	(83)
《小石潭记》创作思想试论	(96)
谈“三吏三别”的同异	(101)
《岳阳楼记》散论	(109)
褒禅山散考	(120)
《原君》论证方法的得失	(128)

《石钟山记》考	(133)
从情景交融与情景相隔的角度看《琵琶行》等三首 琵琶曲的得失	(140)
横看成岭侧成峰 ——谈几篇关于雁荡山的散文	(146)
《游黄山记》小释	(159)
《失街亭》史实考	(165)
《中山狼传》质疑	(176)
关于《国殇》的写作年代	(183)
《孔雀东南飞》的民间传说及疑义新探	(189)
《孔雀东南飞》难句析疑	(196)
《梦游天姥吟留别》文学渊源探微	(204)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辨	(211)
谈《柳敬亭传》的选材	(220)
黄州之贬与西北战事 ——考苏轼《念奴娇·赤壁》的写作背景	(227)
《涉江》与《离骚》考异	(236)

《敕勒歌》小札

北朝民歌《敕勒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牧草丰茂、牛羊肥壮的草原风光图。这首诗不但以它那雄浑而朴实的格调，壮阔而优美的画面在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也为研究中世纪我国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正因为如此，它为历代的文学选本所看中，最近又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这首传诵不衰、妇孺皆知的古代民歌，它的作者是谁，它产生于什么时代，它究竟是哪个民族的民歌等这些基本问题尚不清楚。另外在赏析这首诗时往往只注意到它本身的艺术价值，至于它在民族文学史、民族交流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也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对上述问题作些考辨，借以就正于高明。

一、关于诗的作者

关于此诗的作者，基本上有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种认为是北齐斛律金所作。从南宋的王灼起，至清代的王夫之、沈德潜都持此观点①。

第二种认为是北齐高欢帐下的乐人所作②。

第三种认为是斛律金之子斛律明月所作。清代的袁枚即持此说③。

第四种认为是斛律光父子合作的④。

首先，这首民歌不是北齐时代的产物，而应在北齐之前，因为在北魏时代人们就会唱这首歌了，这在《乐府广题》中就有记载。人们一说起《敕勒歌》，总爱引《乐府广题》，因为在《乐府广题》里第一次记载了关于《敕勒歌》的故事，也是最早把《敕勒歌》与斛律金联系起来的。《乐府广题》是这样记载的：

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悲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辞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⑤。

乍一看，似乎这个故事发生在北齐时代，有本新编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也据此认为是“北齐高欢的军队为北周军队所败”⑥，其实大谬不然。因高欢攻西魏玉壁城（今山西稷山县西南）时是公元五四六年，此时北齐政权尚未建立，高欢还是东魏王朝的军事统帅。由于攻城受挫，七万将士死于疆场，高欢本人也忧愤成疾于第二年正月（公元五四七年）去世，他的次子高洋于公元五五〇年取代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建立北齐王朝自称为帝。又七年以后宇文觉才废西魏恭帝拓跋廓建立北周王朝，这时才会有“北齐与北周”军队之间的战斗。至于《乐府广题》中称北齐神武帝攻北周，这只不过是后人在记事中对前人的尊称，就象《旧唐书》中称太原公李渊为高祖一样。由于攻玉壁时尚无北齐政权，所以说《敕勒歌》是“北齐斛律金”或“北齐乐人”所作就不可能了。

另外，也绝不可能把斛律金与“乐人”混淆起来。从《北齐书·斛律金传》以及《北史》、《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

来看，斛律金出身世家大族，“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斛律金曾依附破六韩拔陵起义军获得王号，降魏后授第二领民酋长（第一领民酋长为他的哥哥斛律平），高欢掌东魏军权后，他又成了高欢心腹，担任过汾州刺史，进爵为侯，齐“天统三年薨，年八十”，死前身为宰相，子尚公主，一门荣耀。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决不可能是“乐人”，也就不应把他与乐人相混淆。

那末，可不可能是斛律金作于东魏时呢？也没有这个可能，其理由有二：

第一，从大家所熟悉的《乐府广题》的记载来看，此歌是东魏统帅高欢在败军之际为安定人心而要斛律金唱的。高欢想必知道，这首歌词高昂壮美，鼓舞人心，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样的场合指名要唱这首歌，可见这首歌原来就已流传而不是即席创作的，再从斛律金一唱，高欢立即能和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二，从斛律金的文学修养来看也没有这种可能。据《北齐书·斛律金传》，斛律金原名阿六敦，由于“性质直，不识文字”，连文件上签署个名字都感到困难。为简便计，把“阿六敦”改名为“金”，因阿六敦在维吾尔语中为altun，即“黄金”之意。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要创作这样一首叠字叠韵、对偶工整的杂言诗，恐怕是件很困难的事。

那末，有没有可能是斛律金的儿子斛律明月创作的呢？这完全是清代才子袁枚的想象之词，因为他所依据的黄庭坚的《山谷题跋》是黄庭坚的误记，宋代的洪迈对此早已作过考辨，这里不再赘述。至于父子合作之说，则是既承认此

诗不可能出自斛律光之手，又想把它与斛律光联系起来的折衷之说。就目前已发现的有关史料还找不出为斛律明月所作的任何证据。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这是敕勒族的一首民歌，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把它定为无名氏的作品，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关于诗的背景

围绕此诗的背景有两个问题：（一）它的产生年代；（二）它是哪个民族的诗歌。

关于它的产生年代，从上面的考辨可知是在北齐之前。但“前”到什么时候呢？这就需要研究一下敕勒这个民族的迁移史。

敕勒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先秦两汉时代称丁零（或丁灵、丁令、钉灵），魏晋南北朝时代称敕勒（铁勒），因为他们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⑦，所以又叫“高车丁零”或高车族。敕勒人原生活在北海（贝加尔湖一带），北魏初年“屯已尼陂（今贝加尔湖）”。北魏太武帝神䴥二年（公元四二九年），拓跋焘“遣左仆射安原将万骑击之，高车诸部迎降者数十万落”⑧。同年十月，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涇，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敕勒族从北海迁于阴山脚下，一开始并没有定居，史载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四三〇年）“敕勒数千骑叛北走，絜（刘絜，敕勒部镇抚史之一）追讨之，走者无食，相枕而死”。八年夏四月（公元四三一年），“敕勒万余落复叛走，魏主使尚书封铁追讨灭之”⑨。自此以后，敕勒族才在阴山地区安定下来。经过他们的辛勤开发，终于使得漠南

地区牧草丰茂，牛羊肥壮，“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⑩，形成了如同《敕勒歌》所描绘的阴山脚下那种和平富庶的景象。由此看来，《敕勒歌》的创作年代最早不会超过北魏太武帝神䴥四年（公元四三一年）。在此之前，敕勒族还没有生活在漠南地区或即使已经迁来但生活尚未安定下来。这是断代的上限，那末下限呢？让我们再翻开《斛律金传》：

正光末，破六韩拔陵构逆，金拥众属焉，陵假金王号。金度陵终败灭，乃统所部万户诣云州请降，即授第二领民酋长^⑪。

正光是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年号，共用了六年，正光末应是公元五二五年，这一年斛律金参加了破六韩拔陵的民族起义，但这个投机家一看风向不对，就率领所属部下万户到云州去投降北魏。云州，即今山西北部朔县。从此，敕勒族离开了漠南地区在晋北定居下来。林庚、冯沅君先生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介绍敕勒族时说“北朝时居于今山西北部一带”，大概就是指其最后定居的地点。晋北地区早已开垦成农业区，到处是“高粱谷子望不到边”的景色，而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敕勒歌产生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因此此歌的产生不会迟于正光末年（公元五二五年）。这是断代的下限。

从上面的考辨可知，敕勒歌的产生时间约在北魏神䴥四年至正光六年（公元四三一年至公元五二五年），《初中语文教学参考资料》说是北齐时代公元五四六年^⑫，时间上稍后了一点；语文课本上的注释“南北朝时敕勒族的一首民歌”，时间上又笼统了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它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诗歌。这本来是个不

成问题的，因为《敕勒歌》当然是敕勒人的歌。但由于对《乐府广题》中“其歌辞本鲜卑语”这句理解有误，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鲜卑族的民间歌辞”^⑬。更有甚者，认为既然是鲜卑族的民间歌辞，那末唱歌的斛律金也就是鲜卑族了。于是就一变而为“高欢让他的鲜卑族部将斛律金唱这首民歌激励士气”^⑭，这个误解的本身无须多解释，因“歌辞为鲜卑语”，同“鲜卑族民间歌辞”完全是两码事，就象陕北民歌《东方红》可以为朝鲜语，但并不是朝鲜族民歌一样。至于说斛律金是鲜卑族将领则完全是望文生义。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敕勒族的民歌为什么变成了鲜卑语？我认为这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东魏这个王朝，它的民族组成主要是汉族和鲜卑族。但因皇帝是鲜卑族的拓跋氏，所以以鲜卑族为主。高欢虽是汉人，但已鲜卑化了，他能说汉语和鲜卑语，而且自称鲜卑人。看来鲜卑语是当时东魏王朝的官方语言，而敕勒是个少数民族，又刚依附不久，他的语言不会太通行，况且听众又是上层“诸贵”，所以它的民歌用鲜卑语来演唱，是很自然的事。

二是与敕勒族的语言形式有关。丁零的中古音为tieng—lieg，敕勒的中古音为t'iək—lək，据日人羽田亨的考证^⑮，这些译音的原文应当是Türk，即突厥(Turkut)，属于土耳其语系，而鲜卑族的语言也属于土耳其语系。所以敕勒语与鲜卑语属同一语系，发音是相近的。《魏书·高车传》也证实了这一点：“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⑯”（着重号系引者所加）。由此可知，敕勒语与鲜卑语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敕勒语和鲜卑语是共通的。因此《乐府广题》云敕勒歌“其歌辞本为鲜卑语”，也可能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并不意味着《敕勒歌》就是鲜卑族的民间歌辞，敕勒族将领斛律金更不是鲜卑族将领。

三、关于诗的文学与历史地位

《敕勒歌》从开始传唱的时候起，几乎就被人们众口交誉。古代一些学者如王灼、王夫之等对此诗皆称赞不已，近、现代的文论家对这首诗雄浑朴实的风格以及壮阔优美的画面也作了许多详尽而中肯的分析。但遗憾的是：这些赞誉和分析往往只注意到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对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民族交往史上的作用却注意不够。而这一点，我认为倒似乎更重要一些：

(一)《敕勒歌》第一次以诗的形式歌颂了祖国的北疆，激起我们对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热爱与向往之情。

在唐代王昌龄、岑参等雄浑豪放的边塞诗出现之前，在诗的国度里，祖国的西北边陲一直是以大漠穷秋、朔风苦寒的面貌出现的，而且也似乎一直与孤城落日、刁斗衔月的战乱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个调子，大概从我国第一部民歌集——《诗经》就开始定了下来：《小雅·采薇》中所描绘的玁狁(匈奴)之地是雨雪菲菲，行役之人则是“载饥载渴”，塞北似乎是一个荒凉苦寒的畏途。汉魏时代陈琳的《饮马长城窟》、曹操的《苦寒行》等乐府诗更是把北方与苦寒、战乱、悲伤划上了等号，几乎成了同义语。但《敕勒歌》描绘的却是一种既开阔壮美又和平安定的草原风光。这里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生活安定，牛羊肥壮。通过这幅壮美而又有

抒情意味的画面，我们不但饱览了壮美的草原风光，而且被那起伏的牧草，那散落在天幕下、隐现在牧草间的白云似的羊群，引起许许多多的遐想，更加激起我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之情。

(二)这首诗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文化互相渗透的有力例证。

公元四二九年以后，敕勒族从贝尔加湖一带移往阴山地区，一开始生活还是很困苦的，北魏政权对归附的敕勒各部采取安抚政策，魏主拓跋焘不同意臣下刘黎等一味镇压的主张，尊重敕勒族“放散日久”的游牧习性^⑮，“赐谷”，“赐衣服”，“岁给廩食”。而敕勒族人民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了漠南地区，迎来了民族最兴旺的时代。不但每年向朝廷大量“献贡”，而且也使得北魏民间“马及牛羊遂至于贱”，到处“毡皮委积”。据《北史·高车传》载：当五部高车合聚祭天时，“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敕勒歌》也许就产生于这“歌吟忻忻”之中。所以我们说《敕勒歌》之所以能够产生，之所以能够出现歌辞中所描绘的那种安定和昌盛的生活景象，这首先是民族和睦的结果。

另外，这首歌是敕勒民歌，却可以用鲜卑语来唱，又译成了汉语，而且受到中国古代汉族学者的众口交誉：王灼认为两汉之后只有“敕勒歌暨韩退之‘十琴操’近古”^⑯；沈德潜则认为“哥舒歌与敕勒歌同是天籁”^⑰。这充分反映了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民族的文学精华，会无保留地受到兄弟民族的赞誉，并被吸收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

另外，从《敕勒歌》的形式来看，它属于可以入乐的北歌的范畴。据日人小川环树考证，北歌形式对唐代七绝的形

成和发展有很深影响^②。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敕勒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就值得大书一笔。反过来看，汉族古典诗歌的押韵、对偶、节奏、叠韵等表现形式，对这首诗的影响也很大。《古诗源》说敕勒歌“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就指的是它在风格上类似汉代以前的作品。祖先系鲜卑族的金代诗人元好问评这首诗时曾说：“慷慨歌谣不绝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③。也指的是它在内容和格调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

(三)《敕勒歌》反映着那个时代北方文学的发展方向，同汉族民歌《西洲曲》、《木兰辞》一道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当“敕勒川，阴山下”这雄浑豪放的歌声响彻北国上空时，南朝的君臣们正在大做宫体诗、艳情诗，沉溺于绮罗香泽之中。北朝的文人们也并不显得高明，即以北魏末年号称“三才”的温子昇、邢邵、魏收而论，所作都不过十来首诗，而且大都模拟齐梁宫体，显得毫无特色。《北齐书·魏收传》载邢邵诋魏收盗窃南朝任昉的诗句，魏收又反过来说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可见实际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相比之下，《敕勒歌》的格调更觉其高，气魄更觉其大，境界更觉其美。它从现实生活出发，以自然优美的笔调、苍茫壮阔的意境反映了大自然美丽而雄浑的风貌以及人民辛勤劳动而赢来的昌盛景象。这种健康的情调和带有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它与同样是产生于民间的《西洲曲》和《木兰辞》一样，都堪称那个时代文学的代表之作。

注:

①见王灼《碧鸡漫志》、王夫之《古诗评选》、沈德潜《古诗源》。

②何白松《关于“敕勒歌”的作者》，见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内蒙古日报》。

③袁枚《随园诗话》。

④荣祥《漫谈“敕勒歌”》，见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内蒙古日报》。

⑤《乐府诗集》卷八六。

⑥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中学语文新增课文教学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版。

⑦《魏书·高车传》。

⑧、⑨、⑩、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⑪见《北齐书·斛律金传》十七卷二一九页。

⑫《初中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一九三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

⑭同⑥。

⑮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原来语言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⑯《魏书》二三〇七页。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

⑰同⑧。

⑱王灼《碧鸡漫志》。

⑲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⑳同⑮。

㉑羊春秋等选注《历代论诗绝句》，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